

# 論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周」

## ——文獻、銅器、考古的綜合考察

何樹環\*

〔摘要〕

西周銅器銘文中屢見當地名用的「周」，長期以來，學界對「周」之具體所指有不同的看法，或以為係「宗周」（鎬京）、「成周」（雒邑）之省稱，或以為指「岐周」，尙有專指「王城」、「成周」、「豐」（豐邑）等諸說。然細繹相關文獻、覈諸銘文、睽諸考古所見建築遺址，歷來諸說皆猶有未妥，其於出土材料或可言之成理者，於文獻則少有可支持之證據，況乎歷來諸說中尙有對出土材料之理解未盡可靠者。亦即西周時用作地名的「周」究為何處，迄今之研究，於文獻、考古、古文字三方面仍未能有統合性、一致性的說法。今乃先就文獻梳理西周時如何指稱岐周、豐、鎬、宗周、成周，從中可清楚看見都邑稱名與時推移的情況，依此情況並可檢視諸說之未當，亦可具體掌握西周時所言之「周」究指何處。乃再進一步以考古所見西周都邑宮殿遺址，及銅器銘文中「周」、「宗周」、「成周」二者稱名相互排斥；「周」、「成周」亦相互排斥的現象加以驗證，終以探明銅器銘文中用為地名之「周」，確實僅能是宗周鎬京。至若鎬京稱「周」，則非宗周之省稱，當是沿襲岐周稱周之舊名而來。

關鍵詞：西周、銅器銘文、周、鎬京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問題的提出與學界諸說概要

西周銅器銘文屢見當地名用的「周」，學界皆以為係一具體地名，唯各家論述之具體所指，則歧異非小，據所見有以下諸說：

一、以宗周即周。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王在王格表》中，首欄即標明「宗周即周」，<sup>1</sup>但無任何說明。余永梁亦以為宗周可簡稱周，其文云：「金文言周東西二都，皆釐然不混，稱鎬京曰宗周，或簡稱周，稱雒邑為〔成〕周。」<sup>2</sup>陳夢家、黃盛璋亦嘗以周為宗周，唯陳氏以宗周當為武王時之岐周，黃氏則以宗周為鎬京。<sup>3</sup>

二、以周為成周。郭沫若云：「彝銘中凡稱周均指成周，以康宮在成周，而屢見『王在周康宮』知之。」<sup>4</sup>莫非斯、謝彥華亦主此說。<sup>5</sup>今從此說之相關論述亦不在少。

三、以周為周王國都城，或為宗周鎬京，或為成周雒邑。陳初生云：「西周先後有兩個政治中心，先是在鎬京稱宗周，其後周成王遷至洛邑叫成周。宗周、成周銘文常簡稱周。因此，弄清銘文中的『周』究竟是宗周還是成周，須據具體情況判定。」<sup>6</sup>唯其所謂「具體情況」為何，則未明言。

<sup>1</sup> 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8，頁21。

<sup>2</sup> 余氏原文如此，唯「周」字前當脫「成」字，引文補之。同文中云：「洛古字本作雒，周禮左傳漢石經字均作雒，則洛古本作雒，與涇洛之洛有別也。洛邑，今河南洛陽縣治。洛邑，亦謂成周。」余永梁：〈金文地名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53、54期合刊。今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40冊，頁387。

<sup>3</sup> 陳夢家認為周亦宗周，唯所指為岐周，云：「武王時之周為宗周，當時未營成周，故宗周應指岐周。」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頁371。黃盛璋：〈周都豐鎬與金文中的鎬京〉，《歷史研究》1956年10期，今據《金文文獻集成》，第40冊，頁405-410。

<sup>4</sup>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暨考釋》（台北：大通書局《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1971年3月），頁8。

<sup>5</sup> 莫非斯：〈西周銅器中之宮廟及由之而考訂其年代〉，《考古社刊》1937年6期。今據《金文文獻集成》，第39冊，頁1-13。謝彥華：〈古代地理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集，81期。今據《金文文獻集成》，第40冊，頁395。

<sup>6</sup>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高雄：復文圖書，1992年5月初版），頁119。朱鳳瀚也有類

四、以「周」為別於宗周鎬京、成周雒邑的另一都城——「王城」。陳夢家云：「成王時器，記王在宗周、鎬京、豐、新邑、成周、王而從無『王才周』之語；成王以後器常見『王才周』而從無『王才王』之語，亦無『王才新邑』之語。似此暗示了『新邑』是成周的較早的稱謂，而『王』是成王以後的『周』。」<sup>7</sup>唐蘭亦以「周」為「王城」。<sup>8</sup>

五、以「周」為岐山周原文王未徙豐之前的岐周。此說又可依「周」是否隨時代而改變分為兩類。陳夢家、尹盛平所言之周是隨時代而改變的，然具體所指尚復有別。陳氏認為武王時之周為岐周，成王以後之周為王城。<sup>9</sup>尹氏則認為武王之前的周為岐周，建都鎬京後，以鎬京為周，成王建雒邑成周後，以鎬京為宗周，以岐邑為周。<sup>10</sup>另一種看法是以周為岐周，持此說者皆未述及「周」隨時代而改變。

---

似的意見：「『周』在西周金文中，如上文所說言是都城之稱，自然未必均是言宗周，且在成周的康宮也可稱『周康宮』。所以西周都城所在如宗周、成周應均可稱之為『周』。」見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1期，頁11。

<sup>7</sup>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366。

<sup>8</sup> 唐蘭云：「這個周，既非宗周，也非成周，應是王城。上面說『饗旁』，下面說『唯還，在周』，可見旁和周不在一起。因王城與成周緊鄰，而旁在宗周，這是由宗周回到周的。」（引案，據〈高卣〉，《集成》5431）「周廟當在洛邑王城，周公作雒邑以後，新邑是周。成王遷都後，鎬京為宗周，在西，成周則在周東。」（引案，據〈小孟鼎〉，《集成》2839）「王城與成周，相去三四十里，決非一日之內能在兩處行事的，下面說『咸既，用牲于王』，不應還在乙酉這一天。說『咸既』，京宮、康宮兩處的祭禮都完了，那麼，『用牲于王』則應是另一天，而從王城回成周的路上恐怕也得一天，這些具體的時間都省略掉了。」（引案，據〈作冊令方尊〉、〈作冊令方彝〉，《集成》6016、9901）分見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頁134、頁182、頁212。

<sup>9</sup>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366。

<sup>10</sup> 參尹盛平：〈試論金文中的「周」〉，《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三號。該文之意並見於氏著：《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頁239。茲引書中之文以見其意：「武王建鎬京以為都，又沿襲先王在周原的都邑名稱，把鎬京稱為『周』，……洛邑建成後，照例要用先王所居地名——『周』來命名這個新邑。此時『周』已有兩個，一個是岐山之陽的『周』，另一個是鎬京也叫『周』。成王五年遷居洛邑，他為了區別幾個地域不同的『周』，就把洛邑命名為成周。……成王五年，稱洛邑為成周，稱鎬京為宗周，周邑仍舊叫作周，所以從此西周金文中，成周、宗周和周，三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排斥的。」

宗德生、<sup>11</sup>盧連成二位先生皆主此說。<sup>12</sup>李學勤先生更以出土材料強調文獻所言岐周周原遺址為周公采地周城之說（李氏文中並未討論銘文屢見之「周」）。<sup>13</sup>

六、以「周」為文王所都之豐，曹瑋先生主張之。云：「『周』自西周初年的銅器開始就有，亘西周時期都有存在。數量之大，出現之頻繁，要超過宗周與成周出現的次數之和。周地的宗廟群落是極其龐大的，不僅有周王族之宗廟，也有王公大臣的宗廟，這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體現，同時反映了『周』在西周時期的崇高地位。其地位如果連西周的都城——宗周都比之不及的話，只有文王在豐地建立的都城——周有此獨尊之位。」<sup>14</sup>

前舉六說，約以時代先後為序，據此可見學界對此一問題之探索雖已歷經年，然仍未形成共識。細觀前賢諸說，未能先全面檢視文獻，探明西周時各都邑的稱名情況，特別是未注意到都邑稱名在不同時期的改變，是造成意見分歧之重要原因。以下乃先釐清文獻所見西周不同時期各都城之稱名狀況，並以之做為討論銘文時的基礎，再進一步結合銘文與考古遺址所顯現之情況，對西周銅器所見之「周」進行討論。

## 二、文獻所見之岐周、豐、鎬、宗周、成周、雜邑

在上舉六說中，涉及西周相關地名有岐周、豐、鎬、宗周、成周、雜邑等，今試先由文獻加以整理，並留意稱名與時代的關係，以掌握西周不同時期言及上述諸地時是如何稱名。

---

<sup>11</sup> 宗德生：〈試論西周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2期。據《金文文獻集成》，第40冊，頁421-422。

<sup>12</sup> 盧連成：〈西周金文所見**莽**京及相關都邑討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3期，頁97-127。

<sup>13</sup> 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2期。後收於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頁227-233。本文據後者引。

<sup>14</sup> 曹瑋：〈也論金文中的「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後收於氏著：《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07-130。本文據後者引。

### (一) 岐(岐周)、周城

岐周之地有周城，故附於此一併說明。岐周乃文王未徙豐之前的西周故地，古公亶父(太王)自豳遷於此，文獻稱岐下、周原、岐周。《史記·周本紀》：

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太王所至之岐下，《史記集解》引徐廣云：

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

裴駟案語謂：「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又《詩·大雅·緜》言此事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於此可注意者，太王居周原，皇甫謐謂「邑於周地」，則「周」亦具地理區域之意味，非僅做為具體地點之名。(此特點在西周銘文中亦偶有所見，說詳下文)

此地又有岐周之名，見於《孟子·離婁下》：「文王生於岐周，率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太王遷至岐山周原之地，據〈大雅·緜〉「俾立室家」、「作廟翼翼」、「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知此立建有屋室、宗廟、城郭。<sup>15</sup>此城於漢以後之文獻謂之「周城」。「周城」於學界尙有太王都邑—故周城，與周公封邑——周公城之爭議。<sup>16</sup>姑且不論「周城」之爭議，據〈大雅·緜〉，太王於

<sup>15</sup> 毛傳：「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sup>16</sup> 《後漢書·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此周城據劉昭注：「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太王所徙，南有周原。」此太王所都之周城。或據《水經·渭水注》：「徑岐山西，又屈徑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史記·魯周公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之語：「周公城，在岐山縣北九里，此地周之畿內，周公食采之地也。」謂太王都邑外別有周公之城。相關考辨參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新出青銅器研究》，頁 227-228。曹瑋：〈太王都邑與周公封地〉，《考古

周原築有城郭，是明確清楚的。

關於岐周，尙有二點是應特別加以說明的，第一，文王以前的岐周亦名之爲「京」、「周」；第二，文王都豐之後，如何稱岐周故都？先說前者。太王所居之岐周，周人或稱爲「京」，亦名爲「周」。《詩經·大雅·大明》三章云：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其六章云：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

文中之「周」、「京」，毛傳云：「京，大也。」鄭箋則與之有異，云：「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對此，《正義》辨明當從鄭箋，云：

〈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其說是也。按，大任爲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其「來嫁于周」係「曰嬪于京」，而文王受命是「于周于京」，周、京顯然是大名與小名的關係。作爲小名的「京」，即大任嫁王季之地，亦太王所居之岐周。

據此，並與前舉皇甫謐「邑於周地」之語合而觀之，可明確二事：一者，太王、王季、文王所居之岐周又可以大名「周」稱之。二者，前所述太王故城，尙有別名稱之爲「京」。

西周之世，據前述，文王都豐之前，岐周之地尙可稱周、京，至若文王都豐以後，如何稱周原故地呢？關於這點，據文獻所見，武王及其後仍以「岐周」、「岐」稱之，唯其中尙有需加以辨證說明者，東周後但言「岐」，則是確定的。

武王時言及「岐周」之文見於《呂氏春秋·貴因》，唯此處是否可靠，猶尙需

稍加辨明。其文云：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

文中之岐周，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云：「《群書治要》、《通鑑外紀》卷三無『岐周』二字。」<sup>17</sup>據此，「岐周」二字之有無，不可無疑。縱令原文如此，此事之可信否亦不無可議。清·崔述即謂「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爲此言耳。」<sup>18</sup>另，《論語·堯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邢昺疏云：「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文王受命，據《詩經·大雅·大明》，乃「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詩文之周即岐周，說已見上，且未聞武王居岐之事，是邢昺疏之「岐周」乃通言文王、武王居西土而王天下。故，縱令〈貴因〉原有「岐周」二字，「岐周」亦當作如是觀，非武王事蹟之實錄。

武王乃至成王時稱周原故地爲「岐周」，此於文獻則有明確可靠之記載。《逸周書·作雒》：「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于鎬，殯于岐周。」《國語·晉語》：「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作雒〉所記乃成王營雒之事，引文乃成王時追記武王事。據此二者，武王、成王時周原故地已改稱岐周，不再如太王時稱之爲「周」。至若成王之後，文獻未見明確言及岐周之事（《詩經·大雅·江漢》「于周受命」一句，若據鄭箋，與岐周有關，然鄭說不可信，說見下文）。

至西周滅亡，平王東遷，據《史記·秦本紀》，仍稱此地爲「岐」。其文云：

周避犬戎難，東徙維（維），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sup>17</sup>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頁1757。

<sup>18</sup> 清·崔述：《考信錄》（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4月，4版），〈豐鎬考信錄〉，卷2，頁28。

文中前後兩言岐，具當指岐山周原之地而言。是東周之後猶循武王以來之稱名，稱岐山周原故地爲岐而不爲「周」。

唯《詩經·大雅·江漢》「于周受命」之文，鄭箋以爲與岐周有關，其說未可信據，是不可不辨。〈江漢〉云：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詩中之「周」，鄭箋云：

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按，此處鄭箋有誤。鄭箋所云「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云云，與其文王遷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召公采地之說有關。其於《詩譜·周南召南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即便以《詩譜》所言爲然，則文王都豐之後，岐周故地既已分與周、召，此地猶得以「周」統稱之耶？於周公封地行封賞召公後代之事，如何可見「欲尊顯召虎」之意耶？此實不可無疑者一。況乎詩文與西周錫命銘文之內容、用語多有相合，將二者加以對照，實未可見「宣王欲尊顯召虎」而於岐周錫命之意。詩文之「文武受命」，與〈毛公鼎〉：「丕顯文武，皇天引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集成》2841）之意無異，「召公維翰」蓋言受命者先祖功烈，此與〈師匱簋〉（《集成》4342）讚揚受命者先祖功績相掄，銘云：「亦則於女乃聖祖考克專右先王，乍厥宏受，用夾召厥辟，奠大命，盥蘇于政。」詩文「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亦即銘文中王勉受命者效法先祖功烈之意也。「肇敏戎公」，〈不其簋〉（《集成》4328）云：「女肇敏于戎工。」圭瓚、秬鬯、土田之賜，銘文多見。至若「自召祖命」，相較於銘文，「召」顯然不應理解爲召公，應當爲「紹繼」之意，猶銘文所見之「更乃祖考」（《集成》2838、4267、4286、4316等）、「用纘乃祖考事」（《集成》4258）。尚可注意者，後者之「用」，亦正與詩文「自，用也」相同。是以知鄭箋所云「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實爲臆測之說，已失詩文原意。其既以「召」爲召康公，自必尋找與

之相關的「周」，乃有此「周，岐周也」之誤。

綜上所述，就文獻所見岐周之事，除眾所周知岐為太王自豳所遷者外，岐周有宗廟；周人稱此為「周」、為「京」，「周」為「大名」，「京」為「小名」；武王、成王時稱此地為「岐周」，不再稱「周」。文獻於成王之後，幽王以前，則未見明確與岐周相關之記載，更無岐周仍可稱周之跡象。據〈秦本紀〉，春秋初猶僅稱「岐」，一如武王、成王後不再稱此地為「周」。

## （二）豐、鎬、宗周

先就豐簡要說明。文王將都邑自岐山之陽遷至澧水西岸的豐，於《詩經·大雅·文王有聲》、《史記·周本紀》皆言之甚明。此地既為周之都城，自當有宗廟、宮室等建築，至若城垣，在〈文王有聲〉中並有所述及「築城伊瀆，作豐伊匹」、「王公伊濯，維豐之垣」，楊寬並據此認為「西周都城有大規模的城牆建築，可能是從文王建都于豐開始的。」<sup>19</sup>文王都豐，事在文王晚年，《史記·周本紀》：「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

鎬，武王所都，其後皆為西周王朝都邑之所在。現雖未可確知武王都鎬之年，但武王克殷前已都於鎬，是沒有問題的。武王時即有鎬京之名，見《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關於文獻中對豐、鎬的稱名，有三點是需特別留意的：第一，鎬亦稱為「周」；第二，鎬又可稱之為「京」；第三，豐在可靠的文獻中，未若鎬有宗周、周、京之名。

對於第一點，可由「宗周」之名出現的時間逆推。學者多謂「宗周」之名乃是因東都雒邑的建成，為與「成周」區別之故，如唐蘭：

成王自稱為成王，就是表示「王業」已經告成的意思。而且把新邑也改稱為「成周」，把原來的鎬京則改為「宗周」。<sup>20</sup>

又如尹盛平：

<sup>19</sup>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頁45。於此應加以說明的是，楊氏所稱之「大規模」，乃因「瀆」（城溝），非不知於岐周已有築城之事。

<sup>20</sup> 唐蘭：〈匜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1期，頁61。

金文中「宗周」始見于成王時代的獻侯鼎銘文：「惟成王大<sub>奉</sub>在宗周」，銘中成王乃是生稱。文獻中「宗周」始見于成王時代的《尚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五年遷居洛邑，他為了區別幾個地域不同的「周」，就把洛邑命名為成周，表示是自己營建的「周」。成王命鎬京為宗周，表示是「宗」（武王）營建的「周」。<sup>21</sup>

姑不論宗周之命意為何，<sup>22</sup>稱鎬京為宗周，乃是與成周相區別，此一看法已是現今學界普遍接受與認同的。意即雒邑未建成、名其為成周之前，鎬尚無宗周之名。那麼未稱宗周之前的鎬又是如何稱名的呢？這點尹盛平曾明確的指出，可稱之為「周」，其說云：

武王建鎬以為都，又沿襲先王在周原的都邑名稱，把鎬京稱為「周」，所以〈召誥〉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王朝步周，則至于豐」，是一個早晨的事情，說明「周」距離豐京很近，「周」必是指鎬京。<sup>23</sup>

據〈召誥〉之文，尹氏所云「周必是指鎬京」，無疑是正確的。唯〈召誥〉為成王時周公攝政期間之事，在更早的武王時，即已見「周」實指鎬京之情況。據《漢書·律曆志》所引《尚書·武成》和《逸周書·世俘》之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武成〉）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周，征伐商王紂。（〈世俘〉）

〈世俘〉之時代，今學界普遍認為屬西周早期之作。〈武成〉所記之時日「壬辰」、「癸巳」，與〈世俘〉之「丙辰」、「丁巳」有異，學者多謂此處當依〈武成〉之文，

<sup>21</sup> 尹盛平：《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頁234、239。

<sup>22</sup> 或謂「宗周」之「宗」乃沿用舊地名「崇」。見王占奎：〈成周、成白、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下冊，頁572-580。

<sup>23</sup> 尹盛平：《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頁239。

<sup>24</sup>至於二文中的「周」，歷來咸視爲鎬京而無異辭。是鎬之稱爲「周」，武王時已然如此。

鎬，於西周文獻中又有「京」之名。《詩經·大雅·下武》：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毛傳：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鄭箋：

此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又，《逸周書·世俘》言武王克殷還歸鎬京，有用俘燎祭之事，其文云：

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

清·陳逢衡《逸周書補注》於此云：

《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即此。

此處之「京」，過去即理解爲鎬京，漢·蔡邕〈明堂月令論〉：

〈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廡之中明堂太室也。<sup>25</sup>

<sup>24</sup> 參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頁438所列諸家之說。

<sup>25</sup> 據清·惠棟：《明堂大道錄》卷1引，見《續皇清經解》，卷147，頁9。

按，鎬京於武王時已有辟靡，《詩經·大雅·文王有聲》：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且〈世俘〉所言薦俘馘之事，確在鎬京之周廟，<sup>26</sup>是蔡邕「京，鎬京也」之說正與前引〈大雅·下武〉以「京」稱「鎬」同。（此「京大室」顯與〈躬尊〉所見在成周雒邑之「京室」有別）

鎬之稱「京」，顯然是沿襲之前岐周稱「京」之舊名（岐周稱「京」則為襲用公劉稱豳為「京」、「京師」之舊名）。王室遷移，地名沿襲不變，此為古史常見之例，如商有諸亳，戰國時楚之國都屢次遷移仍稱郢。<sup>27</sup>應特別留意的是，武王時沿用「周」、「京」之舊名稱鎬，此時舊稱之「周」、「京」，據前述，則已改稱「岐周」，不致混淆。成王後稱鎬者，見於《詩經·小雅·六月》：「侵鎬及方」。鎬或作郟，《國語·周語》：「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郟。」據韋昭注，「杜伯射王」為西周宣王事。

豐在較可靠的西周文獻中，未若鎬一般有「周」、「京」、「宗周」之別名。豐未見稱「京」者，可以無說。學者或以為豐又有周、宗周之名，此則尚需加以明辨。

言豐與宗周有關者，邵英云：

《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穎達疏：「自滅淮夷，而歸于

<sup>26</sup> 參李學勤：〈〈世俘〉篇研究〉。收於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頁69-80。

<sup>27</sup> 《史記·六國年表》：「（楚頃襄王廿一年）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考烈王廿二年）王東徙壽春，命曰郢。」又，《清華簡·楚居》中有14個以「郢」為名的王居，整理者指出「郢不是一個固定的地名，而是武王之後王居的通稱，猶西京、東京之『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下冊，頁187。（《清華簡》之材料承審查人提示，謹致謝忱）

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在此，孔穎達將「宗周」、「豐邑」連文，顯然「宗周」、「豐邑」為同位語，可見豐邑包括在宗周內。<sup>28</sup>

按，邵氏之說本於《尚書·周官》，〈周官〉書序之文於《史記·周本紀》猶尚可略見較早樣貌，<sup>29</sup>正文則屬偽古文，故將正文視為西周可靠文獻，已大有可議，況乎較可靠之書序不同於正文。且邵氏所引亦與《正義》原旨趣有間，實未可憑信。今列次相關原文如下，以便說明。〈周官〉序云：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正義》於段落旨意處云：

及其即位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

其進一步解釋說明云：

〈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

據此可知，《正義》非不知宗周即鎬京，且豐、鎬有別。復檢〈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之《正義》：

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

<sup>28</sup> 邵英：〈宗周、鎬京與莽京〉，《考古與文物》2006年2期，頁42。

<sup>29</sup> 書序之年代約為戰國末、漢文景前。見程元敏：《書序通考》（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4月），頁445-523。

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其既以〈周官〉與〈多方〉為同時事，可靠之〈多方〉謂「宗周」即為鎬京，亦可無疑，然《正義》於〈周官〉經文「歸于宗周」進一步解釋云：

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雒邑皆名宗周。

此處雒邑得名之為宗周，即本於〈多方〉《正義》所言衛孔悝鼎，然此鼎為春秋晚期器，不得視西周時雒邑即有宗周之稱。將此處《正義》與〈多方〉之《正義》相較，則殊為可怪：既以〈多方〉與〈周官〉為同時事，於〈多方〉知宗周即鎬京，於〈周官〉序文知周王在豐，非在宗周鎬京，如何於解釋正文時卻又以豐為宗周耶？蓋因偽古文〈周官〉之正文言「宗周」，故《正義》既未能刪定經文，乃不得不隨文而解也。〈周官〉之《正義》所云「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正是言其隨文而解之旨。故即便以豐與宗周有關，亦當僅是「豐、鎬相近，舊都不毀」，是不得據此謂西周時豐亦蒙宗周之名。

至若豐亦未得「周」之名，似武王時已然如此。《尚書·武成》：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

至成王時，則有確證，《尚書·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此處之豐為文王所都之豐，歷來無異辭。文中豐與周同見，「周」不會是「豐」，甚為明白。成王之後，文獻亦未見豐與周相混或相代之情事。

豐既為文王所都，為什麼未如鎬沿用「周」之名呢？有學者認為：

《春秋》隱公元年何休注云：「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這就是說，文王是受命之君，他要徙居處，而且不沿襲先王所居地名，所以豐邑一直沒有稱周。<sup>30</sup>

按，因受命而不沿用之說恐不可從。據〈匱簋〉銘：「丕顯文、武受命」（《集成》4321）、〈毛公鼎〉：「丕顯文武，皇天引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集成》2841）、《詩經·大雅·江漢》：「文武受命」，知西周時之觀念，武王亦為受命之人，然而武王所都之鎬即可稱為「周」。余以為豐之所以未稱周，與周人都豐的時間過短或不無關係。據前引《史記·周本紀》之文，文王徙都於豐，第二年文王就過世了。而武王伐殷前，鎬已稱為周（前引《逸周書·世俘》、《漢書·律曆志》所引《尚書·武成》）。也就是說，周人都豐約僅十年左右即徙都鎬，「周」隨即被武王所都之鎬所沿用。（即便豐曾沿襲「周」之名，時間肯定也是很短的。目前則未見這段期間內可靠並涉及此稱名的文獻）

### （三）成周、雜邑

西周時成周指的是雜邑。成周是成王時東都雜邑建成後與宗周鎬京相區別的稱名，此已見於上文。成周之名晚於新邑、大邑、新大邑，此亦早為學界所熟知。此地稱「宗周」，乃是東周以後的事（見上文《尚書·多方》《正義》所引《禮記·祭統》衛孔悝鼎銘）。<sup>31</sup>問題是成周於西周時是否如鎬京可稱為「周」、「京」呢？成周與「京」無資料可說，至於是否稱為「周」，則尚需辨明。

有學者認為，西周時的相關文獻顯示成周亦可稱為「周」，但這是不正確的。陳公柔嘗舉《史記·周本紀》之文云：

《史記·周本紀》自「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至「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一段，所述應是武王在洛陽時事。「至於周」之周，不應如《正義》云：「周，鎬京也。武王伐紂，還至鎬京。」果如《正義》所說已「還至鎬京」，則下文「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一句，與上文將無法銜接。<sup>32</sup>

<sup>30</sup> 尹盛平：《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頁 240。

<sup>31</sup> 又《穆天子傳·卷四》所見「宗周」，亦為東周時周王都城，非鎬京。參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年 4 月），頁 235 所引諸家之說。

<sup>32</sup> 參陳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據陳公柔：《先秦兩漢考古學論叢》（北

按，〈周本紀〉此段文字乃概括《逸周書·度邑》而來，且有所增補，茲列二文以供比較。〈周本紀〉：

武王至于周，至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度邑〉：

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名）<sup>33</sup>茲曰度邑。

兩相對照，「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實為《史記》所加之文句，現今學者亦無據此認為武王有具體「營周居于雒邑」之舉措。<sup>34</sup>既知此句所言非當時之實情，「武王至于周」自無與「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相承接之必然性。欲據此謂雒邑於西周時尚可稱「周」，殆不可信。

又，曹瑋亦謂西周時成周有「周」之名，所據為：

---

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頁34。

<sup>33</sup> 王念孫謂「曰」當改為「名」，云：「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即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見《讀書雜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一冊，頁20。

<sup>34</sup> 伊藤道治在〈西周王朝與雒邑〉一文中認為，武王時代在雒邑可能有所建設，這種建設可能不是什麼大規模重新建設的工程，可能只不過是將從前的殷代聚落加以修補。見氏著：《中國古代國家の支配構造》（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7年），頁400。上述所說之意，原文作「おそらく武王のときに洛邑において行われたと考えられる建設は、新たな大規模の工事ではなく、それまでにあつた殷代の集落を補修した程度のものあつたと考えられる。」

《書·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其（引按，當為「齊」）百工，佯從王于周。』」《疏》云：「周者，謂之成周。」

35

按，曹氏所引之《疏》乃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之語，此說亦非確詁。楊筠如於此即謂：

周謂宗周鎬京也，……蓋周公本意欲百工從王行禮于宗周也。<sup>36</sup>

楊說是也。〈洛誥〉於上引「周公曰」同段文句中又云：「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在周工」，即在「周」之臣工，既云以在「周」之臣工往新邑，明「周」非新邑洛。故知同段文字中「佯從王于周」之「周」亦必非新邑。<sup>37</sup>據前述〈召誥〉鎬京稱周以例之，〈洛誥〉文中之「周」，亦當指鎬京而言無疑。

總上所述，文獻所見岐周、豐、鎬、雒邑之稱名，其中因時推移之現象顯然可見，綜括其時代與名稱，約如下表所見：

<sup>35</sup> 曹瑋：〈也論金文中的「周」〉。據氏著：《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107。

<sup>36</sup> 楊筠如：《尚書覈詁》（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年），頁163。

<sup>37</sup> 除文中所舉《史記·周本紀》、《尚書·洛誥》外，彭裕商嘗舉《尚書·康誥》前之錯簡文字為證，認為周為「成周」。然〈康誥〉之錯簡文字究屬《尚書》的哪一篇，歷來說法頗多，至今未有定說。彭說以此立說，容有未妥。屈萬里謂「以諸說按之，謂此章經文應在洛誥篇首者，近是。」若依此說，〈洛誥〉之「周」為宗周鎬京已如文中所述，則錯簡文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周」，乃當指宗周鎬京而言。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5期，頁49-62。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1版2刷），頁145。

表一

	文王前	文王	武王	成王		成王後
岐周	岐周、 周、京	(周?岐 周?京?)	岐周	(岐?岐周?)		岐(岐周?)
豐		豐	豐	豐		豐
鎬			周、鎬、 鎬京、京	周、宗周、鎬、(鎬 京?京?)		周、宗周、鎬、 京師、(鎬京? 京?)
維 <small>邑</small>				大邑、新邑 、新大邑	成周	成周

據表一所見，岐周最初尚稱周、京，武王都鎬稱鎬為京、周後，乃改稱岐周，成王以下即未見以京、周稱岐周之例（文王時可能仍有「周」、「岐周」、「京」之名，文獻有闕，無從確指）。維邑為成周，未嘗見稱「周」之確例，是宗周與成周固不相混，周與成周亦不致混淆。文獻所見文王之後單言「周」者，宗周鎬京也。文王所都之豐，則始終未見稱「周」者。唯語詞之使用未必可截然二分，同一名稱在所指之實質轉換時，也可能存在過渡的形式，如《尚書·多士》中之維邑，既稱「新邑洛」，又稱「作大邑于茲洛」，所以不排除武王時期鎬京稱周時，也存在個別以周稱岐周的可能性（尚無確例）。要之，上表雖只是依文獻所做的結構性區分，並無截然二分之意，但文獻所見西周時「周」所指稱的地名具時代性，以及遷移時稱名的延續性，且成周未有稱周者，這些則都是很明確的。據此衡諸前舉眾說，亦可知諸說皆未得其實。

末由東周之後對王都的稱名，於理解前述稱名因時推移之現象，以及周非成周，亦可得一輔證。西周時於東都是否尚有一王城，今之學者多持否定的意見，<sup>38</sup>東周所稱之「王城」，不與西周之維邑成周相重疊，這點則是肯定的。唯東周時之王城與成周是一個城的不同稱呼？抑或是指兩個城？關於此一問題，已有學者據

<sup>38</sup> 參李民：〈說洛邑、成周與王城〉，《鄭州大學學報》1982年2期，頁13-19、頁7。李民：〈洛邑、成周與王城補述〉，《中州學刊》1991年2期，頁109-113。王人聰：〈令彝銘文釋讀與王城問題〉，《文物》1997年6期，頁39-42。葉萬松、張劍、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年2期，頁70-76。梁云：〈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頁51-55。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11期，頁62-70。

考古材料指出：

平王東遷後在澗河東岸興建了新的都城，還叫「成周」，有時候也叫做「王城」；同時在今漢魏洛陽城那裏修建了用于駐紮諸侯軍隊的「翟泉」城。擴建之，并改名叫「成周」；而只把原來的舊都叫「王城」。「成周」與「王城」遂一分为二。<sup>39</sup>

平王東遷所建新城仍名「成周」，後都城再遷至漢魏洛陽城的位置，亦仍稱「成周」，平王之新城又名「王城」，其後再遷時，因新都稱「成周」，故舊都乃依舊稱仍名為「王城」；此與西周時鎬京既襲用岐周「周」、「京」之名，乃稱周原舊都為岐周，基本上是相當一致的。而《禮記·祭統》所記孔悝鼎銘之「宗周」實為東周之都城，顯然也是沿用西周都城名「宗周」之故。另，東周時稱周王所在都邑為「周」（《左傳·僖公廿四年》）、京師（《左傳·隱公六年》），亦是延續西周時對王朝都邑（宗周鎬京）之稱名而來（西周以京師稱鎬，見《詩經·大雅·民勞》）。

### 三、西周銅器銘文之「周」與考古所見之鎬京

#### （一）「宗周非周」、「周為岐周」、「周即成周」之說皆未的

續純就銅器銘文所見之「周」而言，前引諸家所論猶有可商。綜觀諸家所論列之金文證據，經仔細核對與辨析，「宗周非周」、「周為岐周」、「周即成周」之說皆未可信據，分論如下。

同銘中地名相互排斥的觀點，在討論西周銘文「周」所指為何時，經常被用來做為判斷時的重要參考原則。陳夢家首先依此原則將銘文做了比對，云：

凡一銘之中出現了不同的地方，這些地名是不同所在：

宗周非鎬京      〈士上盃〉、〈麥尊〉（引按《集成》9454、6015）

宗周非豐      〈作冊虢卣〉（引按《集成》5432）

<sup>39</sup> 梁云：〈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頁54-55。又徐昭峰除將位於漢魏洛陽城之城址年代提早到西周晚期外，意見與梁云相仿。見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11期，頁62-70。

- 宗周非成周      〈士上盃〉、〈小克鼎〉、〈史頌鼎〉(引按《集成》9454、2996、2787)
- 宗周非周      〈史頌鼎〉與〈頌鼎〉(同人同年同月異地之作，成王以後器)(引按《集成》2787、2827)
- 成周非鎬京      〈士上盃〉、〈小臣傳卣〉(引按，卣為簋之誤《集成》9454、4206)
- 成周非周      〈頌鼎〉(引按《集成》2827)
- 成周非王      〈令方彝〉、〈令尊〉(引按，同銘，《集成》9901、6016)
- 由上可知宗周、鎬京、豐、成周、周、王六名的互相排斥的關係。王可以是周，但成王以後的周既不是宗周，也不是成周。<sup>40</sup>

其後盧連成承繼此觀點，特別強調了同人作器的現象，並補充銘文之例證：〈大孟鼎〉、〈小孟鼎〉、〈大克鼎〉、〈克鐘〉、〈小克鼎〉(分見於《集成》2837、2839、2836、204、2796)，云：

兩器(引按，大小孟鼎)為孟一人所鑄，時間僅距兩年，銘文明確指出康王二十三年對孟的冊命是在宗周舉行的，而康王二十五年的薦之禮是在周大廟舉行的，周和宗周對立、並舉，可知分別應為兩處都邑。在這組銅器銘文中(引按，克氏三器)，宗周、周、成周對舉，作為地名，不相混淆。大量金文資料證明，宗周就是鎬京，成周即是洛邑，周則專指岐邑，三地分立，各有所稱。<sup>41</sup>

按，陳氏所謂同銘中所見地名當各有所指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其所舉銘文例證有誤，無從顯示其六名排斥，及「周」既非宗周亦非成周之結論。銅器銘文中，始終未見鎬京之記載，<sup>42</sup>故其所列關於鎬京的部分，未可信從。西周時於鎬京、

<sup>40</sup>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頁366-367。

<sup>41</sup> 盧連成：〈西周豐鎬兩京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3期，頁140-141。

<sup>42</sup> 過去有以銘文所見𡗗即鎬京之說，今人已無從此說者。近或以〈德方鼎〉之「蒿」為鎬京，見張玉金：〈德方鼎銘文續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5期，頁43-48。然此字於銘文中當讀為「郊」，參李學勤：〈釋郊〉，《文史》36輯(1992年)，頁7-10。

雒邑外並無一稱為「王城」之都邑，這點從文獻、考古中都已獲得證實，<sup>43</sup>故其所列關於王（城）的部分，亦不可信。「宗周非豐」、「宗周非成周」二者與前文由文獻疏理所得者相同。問題在「宗周非周」、「成周非周」二個部分。

先看「宗周非周」的部分。〈頌鼎〉銘文乃是王在周康邵宮，命頌「官嗣成周賈廿家」。〈史頌鼎〉銘謂「王在宗周，命史頌□蘇□、友里君、百姓帥堦于成周」。前者是周、成周同見，後者是宗周與成周同見。至於結合〈史頌鼎〉、〈頌鼎〉，謂「宗周非周」，未可信據者有二。一者，此已踰越「一銘之中」的原則，而是以一人之器為範圍（前引盧氏之文所舉大、小孟鼎亦同）。二者，即便再退一步來說，同一人之器是否可得出「宗周非周」的結論，由陳、盧所舉諸器來看，顯然並不可靠。〈史頌鼎〉云：

惟三年五月丁巳，王在宗周，命史頌□蘇□、友里君、百姓帥堦于成周。

〈頌鼎〉云：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大室……頌，命汝官嗣成周賈廿家，……

二器所記之時間，若以「三年」為同一年，丁巳、甲戌尚相差 17 天，實未可見「宗周」必然不可為「周」之因素。若依李學勤二器所述前後相次的看法（〈史頌鼎〉在前），<sup>44</sup>則王始終在「宗周」，宗周即周，不亦可乎？況依前舉文獻，宗周鎬京於武王、成王時皆可稱「周」，則此二銘文之情況，視〈頌鼎〉之周為宗周，或許更為合理。至於盧氏所舉大小孟鼎銘文，所記之事分別在廿三年和廿五年，時間差距較前二器更大，就更看不出宗周必然不是周的原因了。

<sup>43</sup> 參李氏：〈說洛邑、成周與王城〉，《鄭州大學學報》1982 年 2 期，頁 13-19、頁 7。李氏：〈洛邑、成周與王城補述〉，《中州學刊》1991 年 2 期，頁 109-113。王人聰：〈令彝銘文釋讀與王城問題〉，《文物》1997 年 6 期，頁 39-42。葉萬松、張劍、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 年 2 期，頁 70-76。梁云：〈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 年 5 期，頁 51-55。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 年 11 期，頁 62-70。

<sup>44</sup> 李學勤：〈頌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古文字研究》26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11 月），頁 160-164。

至於盧氏所舉大小克鼎、克鐘之例，二鼎銘皆記「王在宗周」，鐘銘云「王在周康刺宮」，〈小克鼎〉為王廿三年九月，〈克鐘〉乃王十六年九月，〈大克鼎〉則未記載時間，相較於大小孟鼎的情況，〈小克鼎〉、〈克鐘〉二者時間上的距離就更遠了，更看不出周非宗周的必然性。況且，大小克鼎之器主克與克鐘之克並非同一人，這點李學勤已有清楚的論述。<sup>45</sup>

是以據陳、盧所舉五器而言，銘文所能顯示正確無誤者，僅為「宗周非成周」、「周非成周」，無從顯示「宗周非周」之必然性。復就邏輯關係而言，宗周非成周、周非成周，故宗周非周，此即為其說之內在邏輯（ $A \neq B, B \neq C, \text{故 } A \neq C$ ），然 A、C 若為異名同實，則邏輯式即不成立。據文獻所見，鎬即有周、宗周二別名，難道可以因鎬非成周，成周非宗周，就得出鎬非宗周的結論嗎？

另有學者主張「宗周非周」、「周為岐周」，其理由是來自周原甲骨，此說法亦有未確。在周原鳳雛村西周早期建築基址的窖穴中，出土 2 片有「蒿」字的甲骨

祠自蒿于周 H11:117

祠自蒿于□ H11:20

有學者將「蒿」讀為鎬京之鎬，故「周」即為岐周，並連繫到周原出土的〈史牆盤〉（《集成》10175），其銘云：「~~季~~武王既~~戎~~殷，微史烈祖迺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捨宇于周」，認為西周銅器所見之「周」即為岐周而非宗周。<sup>46</sup>

盤銘與周原所出甲骨，二者皆可另有解釋，據此謂其它西周銅器銘文所見之周皆為岐周而非宗周，並不堅實可信。周原甲骨之「蒿」，自李學勤釋讀為「郊」，<sup>47</sup>信從之學者亦不在少。若釋讀為「郊」，周即不必然是周原岐周，反而可能如《尚書·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之「周」，指的是鎬京。且就文意而言，釋「郊」顯然比「鎬」來得適當。另外，自李學勤、王宇信提出周原甲骨是在周原以外的地方地卜筮的，<sup>48</sup>此說亦受到學界廣泛的注意與重視，那麼 H11:117 所見

<sup>45</sup> 李學勤：〈論克器的區分〉。收於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頁151-156。

<sup>46</sup> 宗德生：〈試論西周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2期。據《金文文獻集成》，第40冊，頁421-422。

<sup>47</sup> 李學勤：〈釋郊〉，《文史》36輯（1992年），頁7-10。

<sup>48</sup> 李學勤、王宇信：〈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

的「周」，就更不會是岐周。至於〈史牆盤〉之「周」，自唐蘭將之理解為岐周，<sup>49</sup>且器物亦出於周原，「周即岐周」之說遂似順理成章。但盤銘之「周」是否即為岐周，是可以再討論的，如李學勤認為「顯然是已分封予周公的周城」。<sup>50</sup>余以為盤銘之「周」視為寬泛之意的「周邦」之「周」，與殷相對，似亦無不可，未必然是具體地名。「周」在文獻與銅器銘文中皆有類似的用例。前文言及《詩經·大雅·大明》時，已可見「周」為大名的用例；另，與〈史牆盤〉同屬西周中期的〈達盃〉，其銘云：「隹三年五月既生霸壬寅，王在周，執駒于漚沚。」<sup>51</sup>「漚沚」是周王在「漚」這個地方的臨時性居所，盃銘既同時言「周」，就不好狹隘地將盃銘中的「周」限定為範圍較小的地名。將盤銘之「周」理解為「周城」或較寬泛之意（與殷相對的周），此二者與器出周原也都不衝突。更重要的是，盤銘所記之事在武王克殷之後，若以「周為岐周」，從前述文獻之情況和時代來看，其實並無法獲得任何支持。

綜前所述，「宗周非豐」、「宗周非成周」，這二點，金文與文獻是相合的。學者所提出「宗周非周」、「周即岐周」的理由，持之與文獻所見者相對照，則並非堅實可靠。

至於陳氏所主張的「成周非周」，是有道理的，但過去則有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成周即周」，故有進一步討論說明的必要。

主張「成周即周」，是根據銘文所見「康宮」的比對。「周」有康宮，如〈申簋蓋〉（《集成》4267）、〈輔師鬲簋〉（《集成》4286）、〈揚簋〉（《集成》4294）、〈師頴簋〉（《集成》4312）、〈休盤〉（《集成》10170），此5器僅是就銘中有「康宮大室」而言，其他尚有「康宮穆大室」、「康穆宮大室」、「康宮捍宮」、「康宮捍大室」等，共有20餘件器，而〈作冊令方彝〉（有同銘之尊），明確記載了成周有康宮，兩相對照，故乃有成周之康宮即周康宮，周即成周之說。

月），頁245-257。

<sup>49</sup> 唐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1978年3期。今據氏著：《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頁209-223。

<sup>50</sup> 李學勤：〈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2期。今據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頁229。

<sup>51</sup>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6月），頁312。

按，若依周即成周之說，何其有成周之宮廟甚夥，而在宗周者甚鮮？此歷來已多有學者質疑。<sup>52</sup>再者，據彝銘只能認為成周有康宮，卻不能擴大解釋為康宮只可在成周，甚至是所有銘文之康宮皆在成周。據新出銘文明確地告訴我們，不但周亦有康宮，且周絕非成周。〈應侯見工鐘〉云：

隹正二初吉，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辛未王格於康宮，榮伯入右應侯見工，易彤一彤百，馬<sup>53</sup>

銘文言「王歸自成周」，續言「應侯見工遺王于周」，則周非成周，斷然無疑。之後，辛未日王至康宮對應侯有所賞賜，此「康宮」在「周」，亦確然無可懷疑。此器清楚地說明了，康宮僅可在成周的想法，顯然不符合實際；據此產生的周即成周之說，亦未可信從。

## （二）結合考古發掘，銘文所見之「周」當指宗周鎬京

西周銅器銘文所見做地名用之「周」，從文獻、考古材料和銘文本身三方面來看，都指向應即為宗周鎬京。就文獻的部分來說，據上文所述，岐周、鎬、雒邑之稱名，除本身名稱的延續性之外，尚有因時推移之現象，鎬自武王即稱為「周」，成王時亦稱為周，成王後之相關文獻雖未見明確以「周」稱宗周鎬京者，但既已知西周時未將成周稱周，武王後亦未將岐周稱周，那麼西周銘文所見之「周」，已清楚地指向當即宗周鎬京。尚可注意者，文獻中公劉所都之豳亦稱京師（《詩經·大雅·公劉》，岐周稱京顯亦沿用舊名），此京師亦見於西周銘文，<sup>54</sup>〈克鐘〉：

<sup>52</sup> 如曹璋：〈也論金文中的「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後收於氏著：《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頁 107-130。然曹氏謂金文所見之周為文王所都之豐，亦面臨相同的問題。另，據《尚書·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是周、豐明確為二地。曹說缺乏文獻支持，茲不取。

<sup>53</sup> 見《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 156-159。又，此與《集成》107-108 內容相同，二銘對照，此器缺「正二月」之「月」字，《集成》缺「康宮」之「宮」字，此器「馬」字後之缺文，當同於《集成》。

<sup>54</sup> 鐘銘之「京師」即公劉所都之豳，即〈多友鼎〉中玁狁所伐之京師。參李學勤：〈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6期，頁 87-92。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9月），頁 235-242。

惟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刺宮，王呼士習召克。王親命克適涇東至于京師（《集成》204）

銘文言循著涇水至豳，此為王在周康刺宮親自對克下的命令，故王所在之周顯然在陝西境內，參照地理位置與文獻所見之周，此周顯非岐周，其必為宗周鎬京無疑。

次將考古材料和銘文結合起來看，考古學家已指出成周雒邑在西周晚期已趨沒落：

從洛陽地區遺址和墓葬的分布狀況看，中期遺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瀘河兩岸。晚期的遺址和墓葬減少。在澗水兩岸，從晚期早段開始，西周遺存開始豐富起來。在晚期晚段，在今魏故城一帶也有一定的分布。<sup>55</sup>

瀘河兩岸約即西周時雒邑成周的位置，今漢魏故城一帶，則是東周時王都成周之所在。據考古所見，西周晚期成周的重要性和周人在此的活動都明顯降低，而西周晚期宣王銅器中仍卻仍不時可見周王在周地宮廟的活動，<sup>56</sup>兩相對照，周恐非成周。至於岐周一帶的宮殿遺址，主要是岐山鳳雛、扶風召陳、云塘、齊鎮四處建築基址，杜金鵬指出其中僅鳳雛一處屬王室，<sup>57</sup>鳳雛所見建築面積和高度都較已知的鎬京 5 號建築基址小不止一半，<sup>58</sup>豐邑和鎬京雖都有成群分布的建築基址（參附圖），但豐邑最大的 4 號基址，總面積約 1826.98 平方米，<sup>59</sup>僅略大於岐山鳳雛，卻明顯小於鎬京 5 號宮室基址。相較於金文中在周的眾多宮廟，依目前考古所見，亦只有將銘文之周視為鎬京方能相符。

<sup>55</sup> 劉富良：〈洛陽西周陶器墓研究〉，《考古與文物》1998 年 3 期，頁 65-66。

<sup>56</sup> 如〈頌鼎〉（《集成》2827）、〈虢季子盤〉（《集成》10173）、〈無叟鼎〉（《集成》2814）、〈善夫山鼎〉（《集成》2825）等。

<sup>57</sup> 參杜金鵬：〈周原宮殿建築類型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學報》2009 年 4 期，頁 435-468。

<sup>58</sup> 「五號宮室整個平面布局為『工』字形，面積為 2891 方米。周原鳳雛面積為 1499.6 平方米，兩者相比，前者大於後者 1 倍；前者主體為 59 米，後者為 19 米。前者是後者的 3 倍。」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西周宮室》（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年 7 月），頁 54。

<sup>59</sup> 參胡謙盈：《三代都址考古紀實——豐、鎬周都的發掘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75。

銘文本身亦透露出「周」當即宗周鎬京之傾向。據〈**趙簋**〉(《集成》4266)、〈**同簋蓋**〉(《集成》4270)，宗周有太廟，而周亦有太廟(見於〈**免簋**〉，《集成》4240、〈**三年師兌簋**〉，《集成》4318)，其見於成周者則稱「成周太廟」(詳下表三)，與前二者明顯有別，可知二銘所見之周當即為宗周。再者，銘文中有周與成周同見一器，宗周與成周亦有同見者(如下表二)，卻無周與宗周同見者。依同銘中地名相排斥的原則，周非成周，故可同見；宗周非成周，亦可同見；周即宗周，故未有同見者。三者，西周銘文所見「王格」、「王在」之宮室中，於宗周者少，居周者眾(詳下表三)。然既已知宗周為鎬京，鎬京於文獻中又可稱為周，且成周末蒙周之名、武王後岐周與豐亦無周此一稱名，則銘文中所見「王格」、「王在」之宗廟宮室多在周的現象，也就明顯地指向銘文多見之周當即文獻之宗周。

表二

(「新」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

著錄	器名	周	宗周	成周	相關銘文節錄
集成 107	應侯見 工鐘	周		成周	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
新 82	應侯見 工鐘	周		成周	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
集成 2787	史頌鼎		宗周	成周	王在宗周，命史頌□蘇□、友里君、百姓帥堦整于成周
集成 2796	善夫克 鼎		宗周	成周	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
集成 9454	土上盃		宗周	成周	唯王大禴于宗周， <b>佶饗</b> 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土上眾史寅殷于成周
新 870	晉侯穌 鐘		宗周	成周	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
新 1795	靜方鼎		宗周	成周	隹十月甲子，王才宗周，令師中眾靜省南或□， <b>玆</b>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成周大室

表三

（「新」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餘為集成號）

周	宮室	著錄	宗周	宮室	著錄	成周	宮室	著錄
	大廟	4240、4318		大廟	4266、 4270		成周大廟	4323
	康宮	107、新 82、 新 1958					司徒澆宮	143、 9723
	康宮大室	4267、4286、 4294、4312、 10170					成周大室	新 1795
	康宮新宮	4272					周公宮、 京宮、康 宮	6016
	康寢	9897						
	康廟	4274						
	康邵宮大 室	2815、2827、 4332、9731						
	康穆宮	4465		穆廟	2836			
	康宮穆宮	新 747						
	康宮穆大 室	4287						
	康穆宮大 室	2819、 10172、新 745						
	康宮𠄎 宮	新 709						
	康宮𠄎 大室	4278						
	康宮𠄎 宮大室	2821、4303						
	康刺宮	204						
	新宮	2780、2784、 4214、新						

		633、新 840、新 1555、新 1874						
	般宮	2783						
	圖室	2825						
	大室	4166、4191、 4244、4256、 4324、16516						
	邵宮	4296						
	師彖宮	2817、4277、 4285、4462、 新 663		大師 宮	2820			
	師量宮	4251						
	師孚父 宮	4343						
	西宮	5431						
	成大室	9898						
	穆王大室	2838						
	駒宮	2831						
	漏卮	新 692						
	師司馬宮	4283						
	周廟	2814、2839、 6013、9899、 新 744						

#### 四、結論

西周銅器銘文中屢見當地名用的「周」，其具體所指為何地，歷來學者意見多歧，本文由文獻之疏理入手，首先釐清西周時岐周、豐、鎬、雒邑四個都邑在各時期的名稱，繼而檢視各家論據之未當，最終由文獻、考古材料、銘文三方面結合，認為現所見西周銅器銘文中當地名用的「周」，只能是指宗周鎬京。文中論述

要點有以下數端：

(一) 疏理文獻所見西周時岐周、豐、鎬、雒邑之名稱，可知彼此間並不混淆，其隨時代轉移之現象亦至為明顯。東周時周王都城已不在西周雒邑之舊址，而仍有「周」、「京師」、「宗周」、「成周」之名，即是轉移現象之延續。在與時轉移之現象中，鎬京自武王以下即可被稱為周，成王時得宗周之名。岐周於文王都豐前雖亦有「周」之名，然武王都鎬後，鎬京為「周」，岐周仍稱岐周或岐，與鎬京之「周」並不相混。以「周」稱鎬京，成王營雒之前已然如此，是以知鎬京稱「周」，非如舊說為宗周之省，而是沿襲岐周舊稱「周」之名。豐、雒邑則皆未蒙「周」之名。又，學界已知商代都亳，屢遷而名不改；楚人都郢，屢遷而仍用舊名「郢」（或某郢）。今梳理西周相關文獻，知西周亦確然如此。此實為往昔所未嘗留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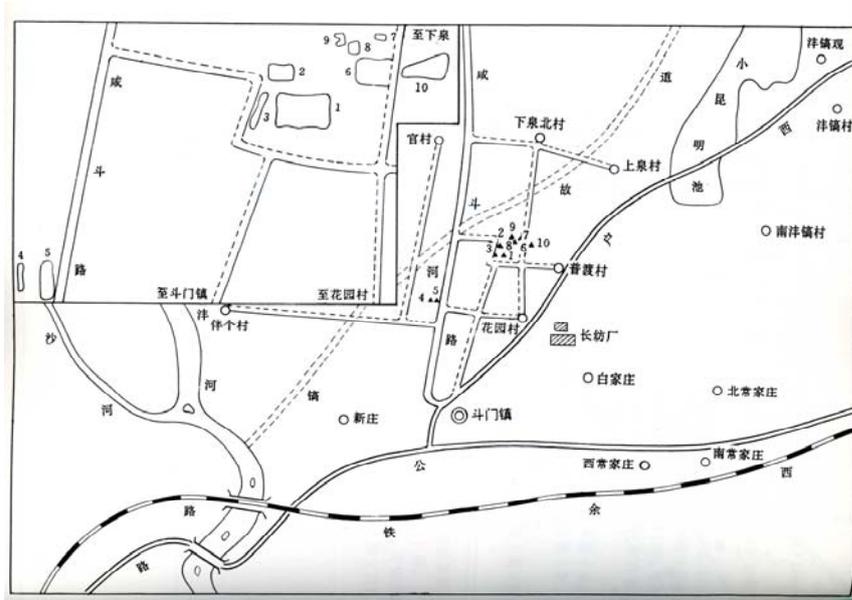
(二) 學者多稱「成周即周」，其所依據者為〈作冊令方彝〉。今據〈應侯見工鐘〉：「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辛未王格于康宮」，知西周時非僅有〈作冊令方彝〉所見在成周之康宮，亦不得據彝銘謂他器所見之周康宮即成周之康宮。鐘銘成周與周同見，則周非成周，斷斷然矣。

(三) 「周乃岐周」之說，所據周原甲骨與〈史牆盤〉皆可另做解釋，非堅實可靠。且據二者視西周銘文中做地名用之周皆為岐周，不但於文獻中得不到支持，亦顯然是忽視武王克殷時，都邑鎬京已稱為周的事實。

(四) 據考古所見，雒邑於西周晚期已明顯沒落，岐周所見王室宮殿基址之數量與規模，皆遠遜於鎬京；豐之宮殿基址雖亦不少，但其規模則亦不如鎬，而銘文所見之周則有眾多宮廟。兩相比較，將周視為宗周鎬京，方能文獻、考古、銘文三方相符。復純據銘文之內容，〈克鐘〉云：「王在周康刺宮……王親命克通汜東至于京師。」京師為公劉所都之豳，依地理位置，此銘之周必然為鎬京無疑。又銘文之「太廟」見於周、宗周，其見於成周者則稱「成周太廟」，且唯獨宗周與周於銘文中不相排斥。以銘文之周為文獻之宗周，銘文、文獻亦兩相符合，毫無齟齬。是周即宗周，當可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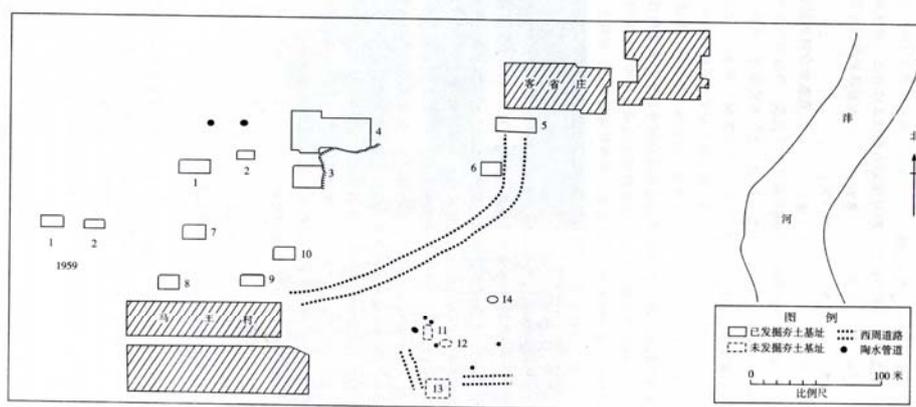
2010年8月19日初稿

2011年12月17日修訂六稿



附圖 1：西周鎬京建築基址分布示意圖

採自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西周宮室》（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年 7 月），圖二。



附圖 2：豐邑西周宮室建築群及相關遺存分布圖

採自胡謙盈：《三代都址考古紀實——豐、鎬周都的發掘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 12 月），頁 74。

## 引用文獻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6月。
- 王人聰：〈令彝銘文釋讀與王城問題〉，《文物》，1997年6期。
- 王占奎：〈成周、成白、王城雜談——兼論宗周之得名〉，《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年，下冊。
- 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1月。
- 王念孫：《讀書雜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第1冊。
- 王貽樑：《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
- 尹盛平：《周原文化與西周文明》，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
- 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1期。
- 吳其昌：《金文麻朔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余永梁：〈金文地名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5集，第53、54期合刊。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40冊。
- 李民：〈說洛邑、成周與王城〉，《鄭州大學學報》，1982年2期。
- \_\_\_\_\_：〈洛邑、成周與王城補述〉，《中州學刊》，1991年2期。
- 李學勤、王宇信：〈周原卜辭選釋〉，《古文字研究》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 \_\_\_\_\_：〈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人文雜誌》，1981年6期。
- \_\_\_\_\_：〈青銅器與周原遺址〉，《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2期。據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
- \_\_\_\_\_：〈釋郊〉，《文史》36輯，1992年。
- \_\_\_\_\_：〈〈世俘〉篇研究〉。據李學勤：《古文獻叢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
- \_\_\_\_\_：〈論克器的區分〉。據李學勤：《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
- \_\_\_\_\_：〈頌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古文字研究》26輯，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11月。

何樹環：《西周對外經略研究》，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0年9月。

杜金鵬：〈周原宮殿建築類型及相關問題探討〉，《考古學報》，2009年4期。

屈萬里：《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1版2刷。

宗德生：〈試論西周金文中的「周」〉，《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2期。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40冊。

邵英：〈宗周、鎬京與莽京〉，《考古與文物》，2006年2期。

《保利藏金》續，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

胡謙盈：《三代都址考古紀實——豐、鎬周都的發掘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12月。

唐蘭：〈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1期。

\_\_\_\_：〈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新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1978年3期。據《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10月。

\_\_\_\_：《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

徐昭峰：〈成周與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11期。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鎬京西周宮室》，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

莫非斯：〈西周銅器中之宮廟及由之而考訂其年代〉，《考古社刊》6期，1937年。

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39冊。

張玉金：〈德方鼎銘文續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5期。

陳公柔：〈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據陳公柔：《先秦兩漢考古學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5月。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高雄：復文圖書，1992年5月，初版。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月。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暨考釋》（《周代金文圖錄及釋文》），台北：大通書局，1971年3月。

崔述：《考信錄》，台北：世界書局，1989年4月，4版。

梁云：〈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2002年5期。

曹璋：〈太王都邑與周公封地〉，《考古與文物》，1993年3期。

\_\_\_\_：〈也論金文中的「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據氏著：《周原遺址與西周銅器研究》，北京：科

學出版社，2004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下冊。

彭裕商：〈新邑考〉，《歷史研究》，2000年5期。

黃盛璋：〈周都豐鎬與金文中的莽京〉，《歷史研究》，1956年10期。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40冊。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

惠棟：《明堂大道錄》，據《續皇清經解》。

程元敏：《書序通考》，台北：學生書局，1999年4月。

楊筠如：《尚書覈詁》，台北：學海出版社，1978年。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

葉萬松、張劍、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年2期。

劉富良：〈洛陽西周陶器墓研究〉，《考古與文物》，1998年3期。

盧連成：〈西周豐鎬兩京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3期。

\_\_\_\_\_：〈西周金文所見莽京及相關都邑討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5年3期。

謝彥華：〈古代地理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7集，第81期。據《金文文獻集成》，香港：明石文化，2004年，第40冊。

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台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4月。

伊藤道治：〈西周王朝與雒邑〉，《中國古代國家の支配構造》，東京都：中央公論社，1987年。

# Where Is Zhou That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in the Western Zhou——Synthesize the Literature, Bronze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

Ho, Shu-huan<sup>\*</sup>

[Abstract]

There is a name of plac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in the Western Zhou called zhou. Where is zhou? Hao-jing(鎬京), Lou-yi(雒邑), Qi-zhou(岐周) or Feng(豐)? We can find the place of zhou change with the times if arrange the appellation in documents in order. Beside the appellation of zhou in documents, we also can conclude the place of zhou must be Hao-jing(鎬京) by the way of the fac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e and compare with Zhou(周), Zong-zhou(宗周), Cheng-zhou(成周)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in the Western Zhou.

**Keywords:** The Western Zhou,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The name of a place called zhou, Hao-jing

---

<sup>\*</sup>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